

2009

熊培云 编选

中国时评年选

China Review 2009

吴晓波 农民第六次拯救中国
单士兵 历史背后的利益
叶檀 消费券好于政府消费，藏富于民好于消费券
冯海宁 只要统计能做假取消啥GDP都没有用
王石川 一个公民的愤怒与一种信仰的沦陷
五岳散人 燃油税又盯上中产阶层？
徐贵 让孩子多问几个“为什么”
杨涛 收容遣送寿终了，收容教育为何还活着？
葛剑雄 不要将什么都称为“山寨”
崔卫平 少数人的权利
黄益平 罗斯福新政的启示
袁伟时 网络语言暴力的根源
梁文道 制造敌人的艺术
孟波 拒绝谎言，哪怕是为了爱国！
方舟子 禽流感不是对人类文明的报复
时寒冰 我的民富路线
舒圣祥 北川政府110万购豪华车令人心痛
李龙 农村大学生比重为何少了一半
秋实 城乡分割的文明后果
袁烈山 新闻开放与社会扁平化
展江 对台湾留学生经济制裁错了

鹰击长空 作品集
花城出版社

2009

熊培云 编选

中国时评年选

China Review 2009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9 中国时评年选 / 熊培云编选.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0. 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5880-4

I. 2... II. 熊... III. 时事评论—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1395 号

责任编辑: 文 珍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区中心路)

开 本 730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3.25 1 插页

字 数 300,000 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序

熊培云

着手为花城出版社编选这本年度时评已经很晚了。紧赶慢赶，总算告一段落。按照惯例，接下来得好好与读者“序序旧”了。

回想近十年来中国人的写作转向，最赏心悦目的景象大概就是“评论中兴”了。如今，不光是写诗歌与小说的人纷纷改弦更张写起了评论，各类报章在版面上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个中翘楚，包括《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东方早报》等报纸，更是不惜成本，每周开辟近二十块版来供读者讨论问题。各路媒体，除了一批精英人士在上面抛头露面，同样活跃着一些来自各中小城市甚至乡村的作者。许多人以评论为业，“做时代进步的生意”。媒体不仅能养活他们，而且能给他们较为体面的生活。说几句“公道话”就能谋生了，为什么？

原因自有千种，大而言之，亦不外乎以下几条：

其一是传播科技的发展。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尤其是伴随着互联网文明的崛起，信息雷同使以发布消息为业的传统媒体不得不转而重视发布观点；

其二是社会解放，一个公民写作的时代悄然来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开放与个体的解放，人们对自由交流的渴望或者要求越来越强烈，参与社会的公共精神也获得了恢复性成长。每位评论员、每个愿意通过自己的文字参与时代命运者，已具有“议员”的作用。

其三是中国改革已经船到江心，进入细节，各种力量的博弈已经日趋激烈。我

曾经将改革开放的30年分为三个10年。80年代是群体争民主，波澜壮阔；90年代是个体争自由，润物无声；伴随着物质生活与社会理性的整体性成长，本世纪初的10年则是充分博弈的10年。评论写作，也只是博弈时代的一束浪花。今日中国，方向已明，很少有人会再去纠结于主义，而是回到具体的问题，如社会保障问题、医疗保险问题、房价问题、税收与财政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农民进城问题等等。

许多人感慨，转型期的中国已经不需要小说了。之所以有此抒怀，恐怕是因为中国这光怪陆离的现实，让那些以想像为业的人对自己的想像力绝望了吧！人们时常感慨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化无穷，给了这个世界无以数计的神奇景观。事实上，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是如此传奇，它体现在“躲猫猫”“临时性强奸”等方面的创造力早已经一骑绝尘、远远超过我们的想像力。

不过，虽说是“评论中兴”，也不是现在才有的事。如果你视野开阔、目光明亮，只需回到上世纪初，就会发现如今这个时代又是那样似曾相识。

打开历史，游目骋怀，倾听两个时代的心跳。而曾经逝去的那个时代，当年的才子佳人们何等意气风发！借着一次次无意有缘的相遇，我陆续了解到了杜亚泉、胡适、董时进、储安平等睿智而坚定的思想者与评论家。无论是《东方杂志》、《独立评论》与《观察》上的评论文章，还是董时进做的农村问题研究，都让我无比震惊，相见恨晚。谓之“震惊”，是因为今日中国人扭扭捏捏讨论的许多问题，杜亚泉、胡适那代人在上个世纪初已经讨论过了，甚至包括“孩子是不是需要读经”这样的小问题。而且，由于种种原因，那代人得出的一些结论，比现在还要深刻。关于这一点，2008年夏天，在我终于通读岳麓书社10卷本的《独立评论》时更是感念犹深。

回想那半个世纪的风流，有多少感慨！2001年，我曾经在《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中重述胡适的思想，阅尽历史的玩笑与鬼打墙；同样，当我用一本书（《重新发现社会》）的篇幅来谈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时，发现杜亚泉——这位比我恰好早生整整一百年的思想巨子，只用一篇4000余字的政论便将我要说的道理全讲完了。这样的時候，你是欣慰多一些，还是绝望多一些？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否定这个时代的意义以及我们身处其中的作为。李慎之先生曾经说过：“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对此我是非常认同的。以我的理解，二十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是流血的世纪；而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改良的世纪，是流汗的世纪。不要奢望哪篇文章对改良社会有个立竿见影、马到功成的效果。如萧瀚最近在“围脖”上与我谈到，“人生一世，唯求心安，有些事做了，有些话说了，便可以了，其他的只看老天了。”

入选本书的作者，很多是我熟识多年的朋友。大家平常聚在一起时，免不了会异口同声地谈到“无力感”这个词——对于你曾经评论或者批评过的事情，一月、两月……一年、两年过去之后，还在发生，依然故我，你会不会觉得沮丧？书生论政，你的批评还有什么意义？类似这样的话我听到很多。真正让一个时评家感到疲

惫的，不是频繁的约稿，而是不断的自我重复。我知道很多写时评的朋友都有这样懊恼的体会。

时评写作，的确是琐碎的工程。然而，这不也是卡尔·波普尔所说的“零星的工程”么？为什么不接受做一些细碎的事情？在我看来，推动一个时代的进步，与我们度过漫长一生的有些道理是一样的。既然我们不可能在一天之中过完有生之年，也就不要指望自己哪篇评论可以立竿见影、改天换地。人生也好，写作也好，还是要做些琐碎的事情的。从这方面说，我是很能理解梁文道兄所说的“写专栏比写一本大书重要”的意思的。胡适当年，不还在自己的刊物上撰写如何刷牙的文章么？

事实上，如果你愿意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就不难发现，从网上海量的细碎留言到遍地开花的专栏文章，时事评论对社会进步的推动还是居功至伟的。从网民最初对孙志刚案的激情参与到现在近乎日常的“网络弹劾”，在某种意义上说，评论的兴起与日常化也是社会力量获得成长的标志性事件。

接下来说说本书的编选“标准”。几年来，我的一些评论也经常忝列杂文年选或者评论年选，然而每次收到从出版社寄来的样书时，心里也并不十分高兴。不是因为不感激编选者的劳动，而是因为我自认为最好的年度文章没有收入其中。我想，如果编选者能让我自荐篇目，再从中挑选，效果一定会好一些。毕竟，我是通读并且了解自己所有文章及其当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的。因此之故，在我编选这部评论年选时，除了我自己寻找以外，我尽可能让熟悉的时评作者自己挑选出几篇自以为最成功的评论，我再从中择一二篇。未联系上的朋友，挑选出的文章若未能代表你本年度的水平或者成就，我只能在此说声抱歉了。

至于其他的“标准”，也是务求简单。一是以时间线索；二是尽可能不遗漏当年出现的重大讨论。虽然都只选了一两篇，仿佛蜻蜓点水，不过作为年选，这一篇文章也算是时代书签，帮大家保留一点本年度的记忆。不无遗憾的是，由于篇幅、时间及其他原因所限，还有很多优秀的评论没有收入本书。

最后，还要感谢郭光东与五岳散人二兄，他们为本“年选”的出版做了不少前期的工作；感谢我的学生马培杰，是她帮我在百忙之中细致地梳理了本书篇目的时序。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所有参与时代写作的朋友们，无论他们的评论是否被年选，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大家“要面包，还要玫瑰”的不懈笔战，使这个社会的公共空间才有了今天的成长——虽多有不尽人意，却也渐渐有了生机与风情。

2009年12月9日

目 录

熊培云 序 / 1

吴晓波 农民第六次拯救中国 / 1

单士兵 历史背后的利益 / 3

叶 檀 消费券好于政府消费，藏富于民好于消费券 / 4

冯海宁 只要统计能做假 取消啥 GDP 都没有用 / 6

王石川 一个公民的愤怒与一种信仰的沦陷 / 7

五岳散人 燃油税又盯上中产阶层？ / 9

徐 贲 让孩子多问几个“为什么” / 10

杨 涛 收容遣送寿终了，收容教育为何还活着？ / 12

葛剑雄 不要将什么都称为“山寨” / 14

崔卫平 少数人的权利 / 15

黄益平 罗斯福新政的启示 / 17

袁伟时 网络语言暴力的根源 / 19

梁文道 制造敌人的艺术 / 21

孟 波 拒绝谎言，哪怕是为了爱国！ / 22

方舟子 禽流感不是对人类文明的报复 / 24

时寒冰 我的民富路线 / 26

舒圣祥 北川政府 110 万购豪华车令人心痛 / 27

李 龙 农村大学生比重为何少了一半 / 28

秋 风 城乡分割的文明后果 / 30

鄢烈山 新闻开放与社会扁平化 / 32

展 江 对伪专家广告该依法惩罚了 / 34

余丰慧 中国版限薪令 / 35

秋 风 阻止乡村在文化上的消失 / 36

周其仁 拉动经济不能仅靠政府 / 38

朱永新 我支持取消文理分科 / 39

倪小林 “购房落户”疑似倒卖户口 / 41

孙立平 经济危机中的失业链条 / 42

刘克军 白血病患儿“幸好遇见总理”暗藏几多无奈 / 44

五岳散人 等贪官自毙的路，实在是太长了 / 45

张 鸣 援助农民工，工会组织在哪里呢 / 47

王 琳 国际公约困住圆明园兽首追索 / 48

程亚文 农民工的出路不在大城市 / 51

杨耕身 从网络社会通往公民社会 / 52

间丘露薇 上海的效率与孟买的自由 / 53

吴晓波 不要把农村当成“泄洪区” / 55

于 平 别让农民工家庭成为“城市孤岛” / 56

沈洪涛 财政政策应考虑面向个人减税、退税 / 58

长 平 两会报道不要只飞花絮 / 60

冯雪梅 代表委员没有理由沉默不语 / 61

长 平 难道要整顿网络以保住“好干部”林嘉祥？ / 63

何 兵 牢头狱霸的今与昔 / 65

莫丰齐 请给出个税不调整的充分理由 / 66

李文凯 代表委员会质疑会回应还要有行动 / 68

曹 林 两会越多政治 街头越少暴力 / 69

- 陈家琪 牢头狱霸们是些什么人 / 71
- 徐迅雷 因为不高兴，一路反到底 / 72
- 朱兰春 不能自主支配的城市土地 / 74
- 信力建 如何化解 2000 亿高校债务？ / 75
- 魏剑美 《中国不高兴》把民族主义当钱卖 / 77
- 安 平 对极端言辞的煽惑性应保持警惕 / 78
- 张千帆 不要再廉价爱国 / 80
- 陈季冰 经济变革政治建构与社会重建 / 81
- 鄢烈山 孙东东们为何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 83
- 熊培云 说说我为什么不高兴 / 84
- 社 论 重申清明的三种价值与理想 / 87
- 安 替 集体中国和公民中国的 G20 / 88
- 吴祚来 回到村庄重拾希望 / 89
- 徐迅雷 政府医疗服务的真谛是什么 / 92
- 易 鹏 别对新医改抱太高的期望 / 93
- 何耀伟 汉字繁体简体，兄弟相煎何急 / 94
- 刘洪波 被统计都是一种幸福 / 95
- 谢国忠 口号没用，民富要紧 / 97
- 唐 钧 看病难报销 医保基金睡大觉 / 98
- 王 攀 美国大学为何敢拒授奥巴马学位 / 100
- 梁文道 汉字、国家与天下 / 101
- 纳税人 我是纳税人，可是光荣在哪儿？ / 104
- 何家弘 以“缓查贪官”换取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 105

- 陈志武 “中国奇迹”八成靠全球技术 / 107
- 单士兵 被成龙先生侮辱与损害的自由 / 109
- 杨 涛 为什么没有“诽谤政府罪” / 111
- 何雄飞 5·12 周年了，请不要把丧事办成喜事 / 113
- 张 鸣 炫富仇富：不能不正视的社会鸿沟 / 115
- 吴杭民 一些专家的公信力真是我们的心病 / 116
- 童大焕 北京户口迟早要灰飞烟灭战略上一定要藐视 / 117
- 蔡定剑 男女平权退休是宪法权利 / 118
- 秋 风 开征物业税面临制度性矛盾 / 121
- 马光远 国企改革需要二次革命 / 123
- 王 琳 绿坝别“拦截与过滤”了依法行政 / 124
- 笑 蜀 公众掌控遥控板是最大的时务 / 126
- 杨耕身 “小学生卖淫案”背后有无另一个习水 / 127
- 吴祚来 “文化渗透”无可指责 / 129
- 付瑞生 学术腐败动摇国本 / 130
- 童大焕 农村养老社保难填城乡鸿沟 / 131
- 社 论 工人以开胸验肺揭穿谎言痛何以堪 / 133
- 魏英杰 网瘾电疗中心就像一座“古拉格” / 134
- 王 琳 那些中学生为什么不得不去征税 / 136
- 张铁鹰 百万精英出国不归该引发怎样的反思 / 137
- 长 平 九零后有多堕落？ / 138
- 党国英 我若是洛阳农民就不会拿土地换户口 / 139
- 柏文学 成都醉驾判死刑为公众安全加防火墙 / 141

- 徽 湖 公务员为何不怕房价高 / 142
- 马光远 有多少官员现在能自己买得起房子 / 143
- 吴木銓 交通规划存缺陷 收拥挤费有何用 / 145
- 邵 建 看晚清三方角力 / 146
- 周国平 《西藏一年》，值得重视的范例 / 148
- 梁文道 网瘾是一种瘾吗？ / 150
- 五岳散人 历史上加税导致的社会动荡 / 151
- 林 达 大炮为什么没打死蚊子 / 153
- 林 涛 治土地囤积必先治扭曲的政商结构 / 154
- 张敬伟 《读者文摘》破产与数字化生存 / 156
- 黄 波 该隐退的不是煤老板，而是煤老板方式 / 157
- 汤劲松 税收不应该打年底双薪的主意 / 159
- 周 泽 打黑除恶不应为法治留遗憾 / 160
- 熊培云 网瘾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 / 162
- 梁文道 依法如何严惩？ / 164
- 于建嵘 建立县级改革试验区的设想 / 165
- 杜 论 达沃斯年会：有思想就有未来 / 169
- 魏英杰 政府不可“诱民入罪” / 170
- 周 泽 邮政专营范围如何确定需三思 / 172
- 廖保平 末班车上的疯狂 / 173
- 杜 论 真正的通识教育不能回避公民精神 / 175
- 童大焕 高考加分应当摆脱行政控制 / 176
- 洪振快 李鸿章会公示他的财产吗？ / 178

- 十年砍柴 祭孔祭的是什么 / 180
- 社 论 开放就是影响力 / 182
- 郭于华 体制弊端不除，“教授治校”只是空想 / 183
- 陈志武 从 2049 年看中国 / 185
- 十年砍柴 “有身份”与“刑不上大夫” / 189
- 王晓渔 网络监督为何以“谣言”的方式出现？ / 190
- 叶匡政 今年我感谢诺贝尔文学奖 / 192
- 熊丙奇 白毛女应嫁黄世仁和教育者观念落后 / 193
- 社 论 行政权力监督无方 钓鱼执法惟利 / 194
- 社 论 番禺垃圾发电厂环评要民主公开 / 196
- 熊丙奇 海归都水土很服了更让人忧虑 / 197
- 袁 岳 离开草根富不过二代 / 199
- 黄 波 唐德刚已逝，我们还要逼近历史 / 200

农民第六次拯救中国

吴晓波

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的萧条以及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东南沿海数以十万计的工厂陷入困境，大量工人被裁员，从10月份开始，百万农民工被迫提早返回乡村，他们将为这轮经济调整付出最大的代价，他们极可能是最受伤的群体。

1989年，我第一次行走中国。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成长在江南城市里的文学青年，我只读到过课本上的中国，在用5个月时间踏遍南部中国之后，我在社会底层触摸到什么叫贫困、什么叫绝望、什么叫不可更改的生活。我第一次知道农民对于中国的意义。在江西井冈山，我找到了袁文才的儿子，他的父亲在1927年把毛泽东迎到了山上，从此拉开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农民革命。我们在一堵泥墙前交谈，墙上涂着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它是60年前的遗迹，虽已褪色，却仍然无比醒目，如附着一个不灭的灵魂。我是在很多年后才恍然，袁文才和他的农民兄弟们之所以抛头颅、洒热血地跟随毛泽东打天下，就是因了这六个字的鼓动。

这六个字赢得了中国农民的心。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土地又一次回到了政府的手中，在其后的20年里，农民以消极怠工来应对新的土地政策。到1978年，中国开始本轮改革开放，也是在那一年，安徽和四川的农民冒死开始包产到户，土地以承包制的方式再次回到农民手中，它对中国的意义非同寻常，30年间，中国改革数次峰回路转，却始终没有爆发粮食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农民在一开始就自行解决了产能问题，这一景象与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在1990年推动休克式市场改革的时候，曾经爆发过严重的粮食危机。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验，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二次拯救了中国。随着土地分包到户，耕作效率大为提升，大量的农村人口从土地中溢出，可是当时的城市实行的是“围城政策”，严格控制农民进城，因为户籍制度的执行，农民在城市无法找到工作，无法享受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因此，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洗脚上田”后，“离土不离乡”，就地办起了乡镇企业，它很快构成了国有工业体制外的一股重要力量，而且是如此灵活和充满生机的力量。就在拥有所有资源优势却体制僵硬的国有企业长期徘徊在放权让利的试验路径上的同时，乡土工业的崛起成为中国经济变革最重要的推动力，也是中国改革的魅力所在，到1987年，邓小平承认，“在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

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人们可以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第238页找到这一段话。以今视之，如果没有乡镇企业的出现，中国经济变革的格局是不堪设想的。

乡镇企业的崛起，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三次拯救了中国。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城市体制的改革，大量的农民被招进工厂，他们很快成为最廉价的、最没有保障的劳动力，因此而形成的成本优势构成了“中国制造”的最大竞争力。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商品横扫全球，靠的正是比美欧日工厂便宜4到8倍的劳动力成本。在经济学上，它有一个很动听的名词叫“人口红利”，红色让人联想到鲜血，这个比喻因此十分恰当。

依赖于农民工工人的“中国制造”，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四次拯救了中国。再送到了1998年前后，房地产成为拉动中国内需的发动机，农民再次成为“城市经营”的利益奉献者，政府以数万元的低廉价格征用无数农田，然后再以数倍、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的价格出让给开发商。地产的繁荣，造就了富可敌国的地方政府、造就了无数的富豪、造就了无数全世界最崭新的城市，以及造就了无数的中产阶级，但是，这一切都基础在中国农民的土地贡献上，在过去10年里，他们成为惟一没有实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社会阶层。

因征夺农民土地而形成的地产繁荣，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五次拯救了中国。现在，轮到他们第六次拯救中国。

正在眼下，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的萧条以及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东南沿海数以十万计的工厂陷入困境，大量工人被裁员，从10月份开始，百万农民工被迫提早返回乡村，他们将为这轮经济调整付出最大的代价，他们极可能是最受伤的群体。据估算，如果经济在明年6月份前无法复苏，新增失业农民工将超过2000万人。这是一个可怕的数据，早在1961年底，因“大跃进”运动失败，中央政府曾经发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将2600万已经进城的农民全数精简下乡，而在1998年前后的国有企业改造中，也曾造成2250万工人的下岗，在当年这都酿成剧烈的社会动荡。

近期的政策动态表明，中央政府在对外贸易和地产消费无法复苏的情景下，试图以巨额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强行拉动中国经济，其成效实在让人担忧。道理非常简单，如果消费——无论是国际贸易还是国内市场——没有复苏，对交通、能源性企业的投入都将是无法保证有效产出的，它除了让少数垄断企业获得大量机会以及造成新的投资浪费之外，很难有正向的效应。

在我看来，当前政府最应该提出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就业保障计划”，以此为核心，实施企业减税、社会保障及失业救济等一揽子救援方案，并对各地政府进行刚性化的考核监督。这样的方案也许比拿出数万亿元救市要复杂得多，但却是根本之道。

当然，政策的轨道似乎正铺向另外一个方向。

在充满了无穷变数的2009年，一个似乎确定下来的事实将是：我们的农民兄弟，将一如既往地、以无比惨烈的方式第六次“拯救”中国。

（选自《金融时报》2008年11月18日）

历史背后的利益

单士兵

杭州西湖在许多人心中，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许多年前，司徒雷登也曾这样说。就在本月17日，这位美国前驻华大使的遗骨，被安葬在杭州安贤陵园，他的杭州故居也被辟为名人纪念馆对外开放。

这让司徒雷登从历史的幽暗中又走了出来。连日来，媒体的报道与评论，似乎让这个完成一次重大的历史转身。在“司徒雷登魂兮归来”的感慨中，在现实对历史嗟叹声里，一个人的司徒雷登，的确是清晰明朗起来了。

其实，早在此次司徒雷登安葬杭州之前，国内许多学者就以大量著述，对司徒雷登的个人行为品格进行大量的还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著述，就是北京大学现任副校长郝平撰写的《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种种介绍，让人们知道，这个美国人，曾经从美国筹钱在中国办大学，以重金聘请国内外著名教授，以“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为校训，把当年燕京大学办成与北大、清华齐名的高校，进而被视为燕京大学的灵魂。

关于司徒雷登的个体品格，其实从来也都不泛滥美之词。当年周恩来也曾对司徒雷登被日本人拘禁时期表现的个人品德予以钦佩的评价，这些年，国内学者越加推崇司徒雷登的个人魅力。司徒雷登自己也曾认为“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甚至他的遗愿也是他回到中国“可以更正一些事情”。而历史，有时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于是，注定是需要后人以勇气与理性来进行恢复还原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天，许多人会以新的目光来打量司徒雷登先生。

以发展开放的眼光，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这当然是进步。问题是，对一个人的司徒雷登形象进行转身，却并不等同于对特定的历史理性进行颠覆。尽管说，当年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的确让司徒雷登这位“大使老爷”的形象不是那么的光鲜高大，那种“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形象，在很多人心中俨然就是失败敌人狼狽落寞的最好写照。然而，那篇文章的确并不是针对司徒雷登个人的，它与其它几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一样，真正的批判对象是美国政府，以及白皮书的炮制人——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我曾做过中学语文教师，清晰记得教材里也是如此表述的。

从这个意义看，只是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的司徒雷登，即便在今天，其实也完全是不必要加以转身的。遗憾的是，我们太习惯于以朋友与敌人、

好人与坏人来对人加以直接划分了。在利益面前，特别是民族利益面前，必须承认，历史这个小姑娘，肯定是要被赋予时代象征的色彩的，一些历史人物肯定会成为某种利益的标签。所谓在利益面前，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才会成为太多历史事件的注脚。也正因如此，司徒雷登安葬杭州，是当今中美关系经历巨大变化的结果，但是，这件事的转身，说到底，更多的也只能指向一个人的司徒雷登，也只是停留对逝者的一种情感慰藉层面。

这是一个在不断开放中蕴蓄多元价值的时代，不论是对历史人物的道德形象，还是相关的历史价值，人们的认识都随时可能发生变更，在复杂碰撞中形成多元化的认同。但是，在任何一个时代，抛开利益视角对历史界定，一定都是不理性的。对此，学者陆建德有一篇叫做《思想背后的利益》的文章，是谈英国学者伯林的犹太认同问题。文中伯林就强调，“对于各种观点、社会运动、人们的所作所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应该考虑它们对谁有利，谁获益最多。这些并非愚蠢的问题。”

所以，今天再看司徒雷登，也还是不能只认个人，不看利益。其实，在历史的大浪中，个体往往又只不过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罢了，历史的风向往哪个地方吹，往往也只是来自历史背后的利益驱动罢了。而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

（选自《华商报》2008年11月22日）

消费券好于政府消费，藏富于民好于消费券

叶 檀

发放消费券的效果要好于积极财政政策。从根本上说，要拉动民间消费，最好的途径是建立市场公平规则。

在经济下行之时，发放消费券不再是经济学者的异想天开，而成为真实的提振消费、进而提振经济的举措。

投石问路已经开始，成都市民政局面向全市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及城乡重点优抚对象发放消费券，人均100元，共计3791万元，持有者可以凭此券到指定商店购买日用消费品。成都市向特定困难人群发放消费券的行为，被认为是拉动内需的真实之举。如果4万亿元人民币的积极财政政策不能马上见效，市场预测各地消费券拉动消费之举可能很快出台。

消费券的本意是拉动民间消费，而积极财政政策是政府消费，进行基础建设扩张，虽然在短期内可以拉动投资，未免失之偏颇。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积极财政政策的项目集中于基建，可以拉动的行业不多，集中在水泥、钢铁、有色金属等领域；可以拉动的企业不多，主要是目前产值失速下滑的央企等大型国企；可以带动的就业人数不多，我国绝大部分新增就业人口集中于民企。

如果政府大量发行消费券，由民间自主消费，可以全面拉升企业产能，而不会给央企吃偏食。消费券的另一重要功能是给出明确的市场信号，大部分消费者购买的是什麼产品，市场缺乏什麼一目了然，企业可以据此制订生产计划，可以损有余而补不足，不至于出现由政府拍脑袋扶持，产生下一轮严重产能过剩的后果。须知，资源错配是我国经济结构的命门。

当然，消费券并非万灵仙丹，以往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发放消费券也只产生了短期效果，而没有让当地经济进入良性循环。消费券不可能改变经济结构，日本到现在还是高储蓄低保障，对于大企业的倾斜政策迄今未变。并且，消费券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透支消费。

如果政府财政有大量盈余，且预期财税收入大幅增长，发放消费券就是让富于民；如果政府财政拮据，像现在各地政府收入捉襟见肘，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消化产能不得不发放消费券，其本质就是透支未来财富，让地税的纳税者埋单；如果仍然不够，那么只能靠发债或者印钞解决问题，其本质是稀释全体国民的财富，损害未来的消费能力。

相比政府完全主导的积极财政政策，发放消费券与减税是一大进步。不过，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结构失衡与民间消费不足的长远问题，更好的办法是建立公平的致富环境，实现与市场机制相配套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从1960年开始实行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奠定日本经济强国基础，也是日本在数次金融风暴的沉重打击下没有彻底趴下的根本原因。

公平的致富环境，首要条件是政府减少与民争利、与企争利式的税收模式，其次是中国经济摆脱对于低效率大企业的依赖，两者缺一不可。如果税收调整到企业与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均衡，则可以起到刺激生产与消费的效果。在此次积极财政政策中，税收政策的重要性略次于赤字政策，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如果我国经济依赖于低效企业，动不动需要给巨无霸们低价资源，给巨无霸们输血注资，将使政府财政收入大量失血，即便政府想改变目前的分配税收模式，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消费券可以救急，而正确的税收激励、市场化机制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则可以使中国立于经济强国之列，不被欧美的消费能力所左右。

（选自《南方周末》2008年12月26日）